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分析

——基于个体和地区异质性的视角

王伶俐,郭冉,周皓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两轮追踪调查数据,使用稀少事件回归模型,讨论了个体、家庭和村居三个维度要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成员外出流动对个体外出流动存在促进作用,另外,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机制仍然存在着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受到家庭成员外出的影响;中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家庭和村居社会网络的连带作用以及当地劳动力吸纳水平的影响;西部地区个体人力资本正向选择性突出,家庭经济水平、村居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同样产生了影响。以上研究结果说明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异质性,且流动人口产生机制的地区差异不可忽视。未来可在流动距离、流入地选择等维度展开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流动人口;农村劳动力;个体和地区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8)05-0072-09

一、问题提出

流动人口历来是人口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在30多年间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突破1亿人,到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接近1.5亿人,并进一步增至2010年的2.21亿人。但2010年之后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甚至总量有减少的趋势。至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6亿人,比2014年减少了568万人。(见图1)这个现象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西部城市发展、本地就业增多进而流动人口回乡密切相关,同时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也加速了这一趋势。

在流动人口研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谁在流动”。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流动人口呈现出普遍化、长期化、沿海集中化、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大特征。^[1]关于迁移和流动行为的产生原因已经有大量研究,最主要的一点是人口的流动是有自选择性的,即具有流动或迁移行为的个体并不是随机出现的,他们表现出在某一方面较为突出的特征,例如健康、教育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选择机制。由于以往主要关注的是流入地的视角,因此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从流

收稿日期:2018-03-08

作者简介:王伶俐,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统计学、人口社会学。

郭冉,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教育社会学。

周皓,男,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学、人口流动与迁移、儿童发展、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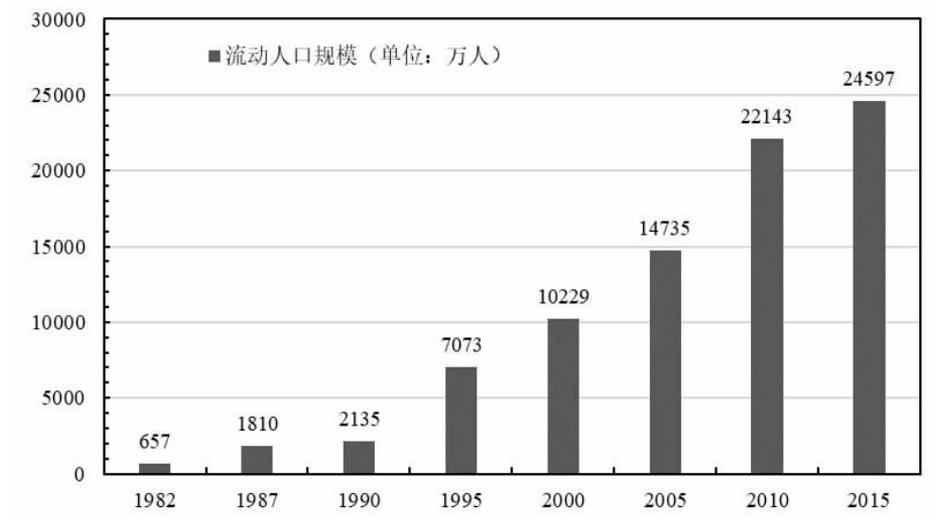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 历次人口普查及 1%人口抽样调查。

出地来看,在个体选择性的基础上,还有哪些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成为外出流动人口产生了影响?这些要素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本文将利用追踪数据,从个体、家庭以及村居条件三个维度来讨论个体流动前的各项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其流动决策的,同时比较各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作用方式,进一步回答“谁在流动”这一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人口流动理论

“推拉理论”是人口流动理论的基石。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经典的迁移理论遵循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们迁移是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随着新的迁移现象的出现,更多的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进行了修正。新迁移经济学从微观角度对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进行了修正,认为迁移的目的在于降低家庭的经济风险,获得家庭经济收入提升的最大化。从宏观角度来看,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历史发展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对国际移民现象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2]

(二)中国乡城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

在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经验研究中,移民或者流动人口并不是一个随机性的群体,而是经过了选择性机制——具有某些特征的劳动者成为了流动人口,并且对移民或流动人口的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异质性,在流动决策做出的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进行了选择性转移。^[3]

具体而言,影响中国乡城流动的因素可以从个体、家庭、社会等几个层次来看。^[4]个体方面主要有就业驱动、增加收入等因素;家庭层面主要有提高家庭收入、家人团聚、家庭发展、社会网络等因素;宏观社会层面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城市接纳能力,政策导向等因素。另外,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收入差距,省内人口流动和省际人口流动都受到了乡城收入差距的拉力影响,市场作为一项重要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迁移和流动决策。^[5]

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会影响其流动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在乡村地区,年龄和婚姻对流动都有负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选择性也受到了较多的讨论。^[6]从新迁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家庭经济水平层面,农村地区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大,家庭成员流动的可能性越低。相对收入、绝对收入较低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可能性更高。从家庭成员的层面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对流动有正向影响,学龄儿童数量对流动有正向影响;^[7]家中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流动表现出负向的阻碍作用,但如果成年子女有兄弟姐妹可以照顾患病的父母,那么父母患病对于成年子女外出流动打工的阻碍作用会降低^[8]。而家庭社会网络会对劳动力省内流动有负向影响,但是对省际流动有促进作用。^[9]

地区条件也会对人口流动决策产生影响。^[10]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好坏与外出就业比例成反比:农业生产力低的地区,外出就业成为该地区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理性选择,反之则更倾向于留在本地工作。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状况也会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对村民外出务工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出省份人口规模越大,流动人口规模也就越大,但流入省和流出省之间的距离越远,该方向上的流动人口数量反而会减少。^[11]在省际迁移的影响因素中,迁出省份的人均GDP、迁出省份的总人口、迁入省份的人均GDP和迁移存量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因素。而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服务水平越高越能够吸引流动人口。^[12]

(三)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的产生机制可以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证视角进行切入: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了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在迁移流动中的作用;新迁移经济学强调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作回报、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要素都是有明显作用的拉力。以往研究也是较多地从个体角度和家庭结构的角度进行流动决策的分析,多是从流入地的“拉力”一端进行分析,而较少从流出地的角度对“推力”和“拉力”进行考察。如果将视角转向流出地,流动人口在流动前的一系列特征是如何影响其流动决策的?同时,现有研究对流出地各项要素的地区差异分析和对流动人口产生机制地区异质性的讨论较少。本文将从流出地地区异质性的视角出发,将流动者个体放回到流动前流出地的环境中,从个体、家庭、村居三个维度来讨论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动力机制及其地区差异。

三、分析框架

我国的人口流动大多是由农村流往城市,其外出流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工作机会,因此本次研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农业户籍外出务工人员 and 农业户籍农村本地居民,使用追踪数据对农业户籍居民中产生的新增流动人口与一直在农村居住人口两部分人群进行比较,从个体、家庭和村居层面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集中讨论各要素作用机制的地区差异。

首先,在个体层面,本文假设农村社区中的劳动力具有异质性,符合一些条件的农村劳动力会选择成为流动人口,而有一些劳动力会继续留在农村。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和身体健康都构成了工作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流动人口的分析框架中,受教育程度代表了劳动力专业技能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就业状况;健康状况代表了个体克服流动过程中阻碍因素的能力,健康状况越好的个体更有可能实现地理上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地适应流入地的工作。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越高,更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

其次,根据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家庭作为更高一级单元在流动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家庭中较多的劳动力外出打工,那么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且需要承担农村家庭的日常劳作任务,可能会降低个体外出流动的可能性;但基于农村流动人口中的亲缘、地缘关系,已外出务工者通过社会网络的形式也有可能产生连带效应,促使仍在流出地的个体外出流动。从家庭经济背景维度来看,经济状况越好,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收益的拉力也就越小,越有可能使个体在本地进行就业,而不是成为流动人口。据此提出假设 2.1 和假设 2.2。

假设 2.1:家庭中有人已经外出打工,个体更有可能也选择外出流动。

假设 2.2: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个体成为流动人口的可能性更低。

从流出地的角度来看,个人所处的地区环境将对其行为产生影响:一是当地的经济状况;二是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当地村居的经济状况越好,对劳动力就越具有吸引力,反之该地区则有可能由于地区间的工资差导致劳动力流出。交通便捷程度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离区域中心的距离远近关系到本地区对于资源获取的便捷程度,若本村居离区域中心越近,可以认为其越容易获取来自中心的资源,与区域中心的发展差距较小。因此,可以假设,距离区域中心越远的地区越难获得资源,因此更有可能导致当地居民做出流动的决策。同时,地区的自然地理属性也会影响个体的流动决策,如果流出地村居处在农业生产区、矿产区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区域,则对本地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进而降低了人口的外出流动可能性。因此针对村居条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1:所在村居经济情况越好,个体成为流动人口的可能性越低。

假设 3.2:所在村居劳动力吸纳能力越强,个体成为流动人口的可能性越低。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使用的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 和 2012 年的数据。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2010 年展开了正式基线调查,2012 年对基线调查的样本进行了追踪访问。因此结合两轮调查,CFPS 数据库可以提供比较详细的追踪信息,提供被访者在不同时间点上各项状态的变化,这对更精确地划分新增流动人口、追溯流出地信息提供了便利。

本次研究的因变量是 2012 年受访者是否是农业户籍新增流动人口。在 2012 年的家庭关系库中筛选出当前在家中常住和不在家中常住的个体,再将不在家中常住的个体作进一步的条件限定,需同时满足外出时间在 2010 年调查至 2012 年调查之间、户口仍在本地本家庭、流出原因为外出务工这三个条件。之后将此数据与 2010 年成人问卷、家庭问卷、社区问卷进行合并,得到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库。本文将分析范围设定在 2010 年居住在农村、年龄在 18 至 59 岁之间的人口。

本文只选取农业户籍的新增流动人口和一直常住农村本地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将新增流动人口编码为 1,一直常住农村本地人口编码为 0,其余编为缺失,得到了一个二分的因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在判断流动人口属性时使用了 2012 年的数据,判断完成后利用追踪数据的特点,向前回溯新增流动人口和一直常住农村本地人口在 2010 年时的特征。因此本文的因变量是 2012 年的流动状态,自变量部分均为 2010 年的滞后变量。

(二)变量选择

自变量的选择主要有三组,分别对应了个体、家庭和村居特征。个体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在

2010年时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上个月收入对数。家庭特征包括家中是否有人外出打工和家庭2009年调整后的年总收入对数两个变量。村居特征中使用“您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这一问题来反映本村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村民社会网络对本村常住人口外出决策的影响；使用本村居到省会的距离来标识当地的交通便捷程度以及资源获取能力；使用“是否占有总户数10%或以上的大姓”来反映村居的宗族聚居情况，进一步对基于亲缘的强关系是否对产生新增劳动人口产生了影响；使用是否是矿产区来测量本地的劳动力吸纳能力。

经过条件筛选，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数为7611人，其中两年间新增流动人口为476人，占比为6.25%。被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5年，基本等同于小学六年级水平。有42%被访者所在的村居存在着有人外出打工的现象。被访者所在村居到省会的平均距离为278.79千米。各变量的具体描述性分析请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或百分数	标准差
2012年是否新增流动(0=一直常住)	7611	0.06	0.24
个体特征	7611		
男性(0=女性)		0.48	0.50
年龄		42.03	10.73
受教育年限		5.85	4.05
健康			
不健康	1327	17.44	
一般	2652	34.84	
健康	3632	47.72	
月收入		5913.56	9511.80
户口所在地区			
东部	2561	33.65	
中部	2117	27.82	
西部	2933	38.54	
家庭特征	7611		
家中去年是否有人外出打工		0.42	0.49
家庭年总收入		30592.21	48781.01
村居特征	7611		
村人均年纯收入		2966.29	2162.74
本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占比		34.16	20.79
占总户数10%以上的大姓(0=没有)		0.80	0.40
到省会的距离(公里)		278.79	179.58
矿产资源区(0=不是)		0.09	0.29

本文中2010到2012两年时间内从农村流出的新增流动人口为476人，占比刚超过5%。此时使用常规logistic回归将导致回归系数有偏，产生“稀有事件偏差”。根据因变量以及自变量的分布特点，本文将使用针对稀少事件的cloglog回归方法。本文所关注的各要素作用的地区差异情况，由流出地的区域属性来反映。本文将个体的户口所在地按照省份进行分类，共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对三个区域的样本进行分析，以体现新增流动人口产生机制的地区差异。

五、数据结果

表2展示了对个体是否会成为新增流动人口进行稀少事件logistic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是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分析

将全部地区的样本合并在一起进行稀少事件 logistic 分析, 模型 2-4 分别对户口所在地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的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维度的变量在各地区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

表 2 2012 年是否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稀少事件 logistic 回归结果

	(1)	(2)	(3)	(4)
	全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男性	0.4826*** (0.1043)	0.5853** (0.2249)	0.4336* (0.1893)	0.4602** (0.1515)
年龄	-0.0793*** (0.0047)	-0.0779*** (0.0098)	-0.0854*** (0.0091)	-0.0763*** (0.0071)
受教育年限	0.0483*** (0.0142)	-0.0037 (0.0347)	0.0434 (0.0298)	0.0734*** (0.0190)
自评健康 (0=不健康)				
一般	0.4437* (0.1950)	0.3293 (0.3948)	0.4385 (0.3702)	0.4580 (0.2841)
健康	0.4818* (0.1897)	0.3019 (0.3947)	0.3232 (0.3641)	0.6058* (0.2720)
个人上月收入对数	0.0508*** (0.0144)	0.0434 (0.0302)	0.0325 (0.0238)	0.0703** (0.0236)
家中有人外出	0.7324*** (0.0954)	0.7537*** (0.2045)	0.8600*** (0.1799)	0.6361*** (0.1410)
家庭年收入对数	-0.2941*** (0.0530)	-0.1531 (0.1191)	-0.2324* (0.1109)	-0.4036*** (0.0765)
到省会的距离 (公里)	0.0007** (0.0003)	0.0013* (0.0006)	-0.0003 (0.0006)	0.0012** (0.0004)
村居外出打工占劳动人口之比	0.0054* (0.0022)	0.0029 (0.0049)	0.0095* (0.0047)	0.0013 (0.0034)
占总户数10%以上的大姓	0.3672** (0.1337)	-0.1709 (0.2777)	1.0506** (0.3655)	0.3373+ (0.1799)
村人均年纯收入对数	-0.1933*** (0.0577)	0.1015 (0.1412)	0.0138 (0.1313)	-0.3690*** (0.0855)
矿产资源区	-0.3849* (0.1936)	0.2903 (0.4668)	-1.0759** (0.3702)	-0.3799 (0.2798)
常数项	2.2630** (0.6903)	-0.8803 (1.6510)	0.1064 (1.5461)	4.1947*** (1.0525)
N	7611	2561	2117	2933
chi2	602.5613	107.3421	228.8481	294.6232
ll	-1478.9538	-387.6841	-416.8472	-644.0665

注: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

(一) 个体特征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在全部样本模型中, 男性显著地比女性更有可能成为新增流动人口, 年龄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年龄越大, 成为流动人口的可能性越低。在个体特征层面, 教育和健康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选择性。具体表现为, 受教育年限越高, 个体越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 与自评不健康的人相比, 更健康的个体更有可能外出流动。个人经济收入状况对外出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收入一方面体现了个人能力较强, 另一方面较高的收入能够使流动成本带来的阻碍效应降低, 因此更有可能推动个体外出流动。

从分地区的模型结果来看, 受教育年限的作用方向在地区间有所差别, 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的作用为负但并不显著, 在中部地区为正但也不显著, 仅在西部样本模型中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个体健康总体上呈现正向作用, 且在西部地区健康的正向选择性尤为明显。从流动人

口的产生机制来看,来自于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更明显地具有人力资本的正向选择。西部地区距离东部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路程较远,劳动力外流需要克服更大的阻碍。在西部地区的农村中,个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意味着具有向外流动的能力,以及对外出流动较高的收入预期;而较好的身体素质能够尽量降低流动过程中的阻碍,有助于实现外出流动。

(二)家庭特征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从全部样本模型来看,家中有人外出务工和家庭经济状况都影响了个体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可能性。作为最直接的信息来源,家庭中的外出务工人员会将城市就业的相关信息传递给仍在老家的农村劳动力。这种基于血缘的强关系会产生流动的连带效应,从而促进新的流动人口的产生。从家庭经济背景来看,个人所在的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越不可能成为外出流动人口。根据新迁移经济学对家庭相对剥夺感和迁移决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家庭收入较高会降低相对剥夺感,个体对在本地的生活感到满意,外出务工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较小,进而降低了外出务工的可能性。

分地区来看,家中有人外出务工在东、中、西部模型中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说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行为带动能够显著地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从流动人口的角度来看,家庭连带的流动模式是十分常见的,也进一步说明流动人口的外出务工选择会明显受到来自家庭的强关系的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作用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显著,家庭收入越高,个体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可能性越小。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内部家庭之间收入分化水平并没有过于悬殊,因此家庭经济变量的作用并不显著。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自然环境、资源配置的差异性较大,在同一区域内部家庭之间的经济分化水平也可能较大,因此家庭收入较高者在本地占有较大的优势,选择不成为流动人口有利于家庭经济水平的继续维持。

(三)村居特征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村居条件中到省会的距离、本村外出打工占比和拥有大姓对个体成为新增流动人口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居人均年纯收入和属于矿产资源区对外出流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地区资源分配分化形成了向外流动的推力,同时基于地缘的同乡带动使得个体更有可能成为流动者。

对于东部和西部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所处的村居距离省会越远,越有可能促使他们成为流动者。从宏观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看,区域的中心程度关乎到对资源的获取能力,距离中心越近,有更大的几率获取资源,并且获得更优质的资源。由于存在资源分配和机会分配的不均,中心地区往往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距离区域中心较远带来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劳动力向资源更密集的地区流动,通过外出打工来提高经济收益。

外出劳动力占比和是否有大姓两个变量代表了该村居的社会网络关系状况,社会网络越紧密,个体更有可能成为新增流动人口,这一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这反映了基于强关系的乡村社会网络既可以获得关于外出流动的信息,同时也增强了消息的可信度,促进当地农业劳动力向外地的转移。

村居的经济水平是影响个体是否外出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西部地区,个体所在的村居人均年纯收入越高,其外出流动的可能越小,但这一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并不存在。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所要付出的成本,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当本村居的经济条件较好时,会在周边形成吸引力,吸引劳动力流入,本村的居民也能够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优势资源。相较之下,外出流动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财力、体力等成本。所以,当外出的收益不足以覆盖流动成本时,个体更有可能选择本地就业。

六、结论

针对农村劳动力是否会成为新增流动人口,本文使用稀少事件 logistic 回归方法,基于地区差异性的视角,从个体、家庭和村居三个维度进行了考察。从总体来看,年龄的增加会降低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可能性,教育和健康具有高度的正向选择性;家庭收入越高,个体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可能性越低;家中有人外出务工会显著提高个体成为流动人口的可能性;生活在较远离区域中心的村居的居民更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村居的社会网络关系越紧密,越有可能通过信息传递和连带效应促使个体外出流动;而生活在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村居的个体,更倾向于在本地就业。

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产生机制有所差别。东部地区个体外出流动主要受到家庭要素的影响。中西部的流动人口产生机制较为复杂。中部地区主要受到家庭外出、村居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同时中部地区位于矿产资源区的村居显著地吸纳了当地的劳动力,减少了劳动力的向外流动。西部地区,在流动人口产生过程中个体自选择性凸显,表现为正向的教育选择和健康选择性,家庭和村居的作用模式与中部地区有类似之处,同时离区域中心的距离、村居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显著地影响了西部地区新增流动人口的产生。

由此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产生机制体现了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较为便捷,能够接纳流动人口的地区较多,因此可以就近接纳流动人口,因而在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多地会出于家庭的考虑做出流动决策。在中部地区,各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较为明显,例如中部地区有较多的矿产分布,围绕矿产相关的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中部的矿产区的本地劳动力显著地不外流,甚至当地还会吸纳一部分来自外地的劳动力以满足生产需求。同时中部地区还体现出家庭、宗族社会网络的作用,同乡连带和同乡聚集会显著地增加个体外出流动的可能性。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地域较为广阔而人口分布较稀,因此个体的自选择在西部地区显得较为突出,经过正向选择的劳动力具有更好的克服流动障碍的能力,实现向外流动。同时家庭和村居的一系列要素也综合作用于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产生机制。这说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过程是较为复杂的,来自于个体、家庭和当地环境的多重要素都叠加进了这一决策过程中。

以上结论说明流动人口的产生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同时也要注意流动人口的产生机制存在着地区差异,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的异质性。

七、讨论

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有很大差异,因此在讨论新增流动人口问题时有必要加入地区差异性的视角。在本文讨论了不同地区之间农村劳动力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形成机制,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特征等的作用方式,对于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但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拓展的部分。

首先,通过对村居便捷性和中心性的考察,可以得知处在较为远离中心村居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成为新增流动人口。但本文只对流动决策中的是否进行流动进行了讨论,未对流动距离进行考察。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扩展流动决策的内容,考察个体在流动距离、流入地选择

上的表现,进一步丰富流动选择性的研究结果。第二,从流动的后果来看,新迁移经济学认为,相对剥夺感在移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通过选择最有可能获得收入提升的成员进行迁移,这一机制有效地获得了家庭收入的提升。那么在中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打工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家庭经济地位?这需要在外出务工收入的分配、寄回家中的汇款等方面展开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村人口流动与家庭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对新迁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背景中的适用性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两轮追踪数据对农村劳动力成为新增流动人口的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个体、家庭和村居三个维度的要素对个体是否流动的异质性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对家庭和地区新增流动人口的产生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一群体和这一现象,也能够进一步推进对这部分人群的公共服务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段成荣,杨舸,张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6).
- [2]D S Massey, J Arango, G Hugo,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3(3).
- [3]郭熙保,黄灿.刘易斯模型、劳动力异质性与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J].河南社会科学,2010(2).
- [4]潘静,陈广汉.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J].经济评论,2014(3).
- [5]蔡建明,王国霞,杨振山.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J].人口研究,2007(5).
- [6]齐亚强,牛建林,威廉·梅森等.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J].人口研究,2012(1).
- [7]周皓.流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2).
- [8]J Giles, R Mu. Elderly parent health and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of adult childre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Demography,2007(2).
- [9]胡金华,陈丽华,应瑞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0(8).
- [10]刘生龙.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4).
- [11]巫锡炜,郭静,段成荣.地区发展、经济机会、收入回报与省际人口流动[J].南方人口,2013(6).
- [12]李拓,李斌.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J].中国人口科学,2015(2).

[责任编辑 吴燕霞]